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xxxii, 1095pp.

從1978年起，劍橋大學出版社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推動下開始出版《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叢書。31年後，此書的宋史部份在學界翹首期盼下終於問世。《劍橋中國史·宋史》共分為上、下兩卷，2009年出版的是上卷，下卷預計2012年以後才能和讀者見面。筆者此處介紹的上卷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史樂民(Paul J. Smith)主編，內容洋洋大觀，厚達一千多頁，覆蓋五代十國和兩宋時期的政治軍事變遷，集成了海外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是海外中國史研究中五代史和宋史部份的權威之作。

本書各章節及作者分別為：「序言」，史樂民執筆；第一章「五代」，Naomi Standen 執筆；第二章「唐宋之間的十國」，Hugh Clark 執筆；第三章「宋代的建立：太祖、太宗和真宗」，柳立言和黃寬重執筆；第四章「仁宗英宗之治」，Michael McGrath 執筆；第五章「神宗與王安石變法」，史樂民執筆；第六章「哲宗與黨爭」和第七章「徽宗、欽宗與北宋的滅亡」，Ari Daniel Levine 執筆；第八章「南遷和高宗之治」，陶晉生執筆；第九章，「孝宗」，江偉愛執筆；第十章「光宗和寧宗」、第十一章「理宗」和第十二章「度宗及其繼承者」皆由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執筆。本書大致反映了西方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作者羣中雖然有柳立言、黃寬重、陶晉生等港臺學者，但是他們均曾在美國求學、執教或訪學，所以這幾章仍然是西方學術系譜之下的對話和研究。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書中每一章做出全面概括，這裡僅就本書的一些重要特色談談體會。

首先，本書十分重視五代十國在歷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地位。英國史家 Naomi Standen 在第一章中敘述五代變遷，從朱溫篡唐開始，一直寫到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宋朝。整章着重一條主線，就是五代時期各個統治者如何歷經努力，並配合外部環境的變遷，逐步解決困擾中晚唐多年的地方割據問題，重新樹立了中央政府權威。他們積極引入文官治國，加強禁軍建設，削弱節度使的自治力和對中央的威脅。最終，趙氏兄弟可以擺脫以往的惡性循

環，成功建立一個穩定的宋朝政府，開創出歷史上新的一頁。

海運史名家 Hugh Clark 的第二章講述十國之興衰，強調這些南方的割據勢力發展經濟、促進社會轉型的努力。不少晚唐叛亂的軍事領袖在南方建立自己的政權，將自身成功轉變為地區精英領袖，塑造權威，贏得當地人民的效忠。南方各國的統治大多比北方穩定持久，因此可以吸引大量北方移民，又能配合氣候和地理優勢，大力發展經濟，鼓勵技術進步，並支持海外貿易。南方的這些建設日後成為宋代繁榮的良好基礎，崛起的地方精英日後成為宋代政府的中堅力量，僻處一方的十國反而成為有宋一代帝國的核心區域。五代十國這兩章佔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一，可見近來西方學界對五代十國之重視。

此外，柳立言和黃寬重負責的宋初三帝一章也提出不少有意義的觀點。比如趙匡胤並沒有「抑武」，而是注意控制軍隊的指揮權；西北邊境西夏的興起阻礙中原和中亞的來往，促使宋朝政府注意力南移，發展海外貿易；以及澶淵之盟中宋國對遼國歲貢看似屈辱之策，但其節省了巨額軍費，大部份白銀也通過邊境貿易回流，其實是一個實際有效的政策。此處關於澶淵之盟的新看法是斯波義信當年首先提出的，在海外有很大影響，也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兩宋之際政權之間的相互關係。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本書最長的一章——第五章「神宗與王安石變法」，由史樂民主筆。同一般討論王安石變法的作品不同，史樂民並沒有糾纏於經濟社會方面的具體政策討論，而是先從大方向入手，深入探討王安石的改革理念。王安石主張擴大君權、提升政府行政干預力度，並加強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控制。史樂民先是仔細描寫王安石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掌控朝政、推行新法、打壓異己，然後敘述青苗、保甲、免役、市易等新法的具體措施和反對派的激烈批評，最後提到新法因過分追求歲入而偏離了原始理念。新政的很多結果與王安石預期相反，反而加重平民的負擔，擴大了貧富差距。史樂民也討論了神宗和王安石用兵西北的戰果。與國內學界熟知的曾瑞龍的研究結論不同，他認為神宗時拓邊西北的努力是失敗、無效果的。

總體而言，史樂民的第五章分量重、寫作清晰，單抽出來也是一部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經典研究。美國宋史學界關心題目廣泛，但是對王安石變法卻一向着墨不多，除了當年劉子健的名著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之外，近幾年只有冀小斌出版了一部研究司馬光和保守派的著作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

(A. D. 1019-1086)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史樂民的這章內容可以作為英語學界學生了解王安石變法的權威入門參考，其政治力角逐的切入點也值得國內學界參考。

佐治亞大學的 Ari Daniel Levine 教授對哲宗和徽宗時代黨爭和變法的研究也很有特色。一般而言，國內的北宋史研究重熙寧、元豐，輕紹聖、崇寧、大觀。近來美國學界卻對北宋後期、尤其是徽宗時代蔡京政府的政策十分關注。自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幾年前首開風氣之先，通過對兩宋的史料分析重新審視秦檜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現存徽宗到高宗朝史料有極大偏頗性，傳統史學中對徽宗和蔡京的批判指責並不全面，應小心辨別。Levine 在第七章也討論此問題，並主張迴避道德評判，從客觀角度來評論蔡京的行政，突出介紹蔡京主政時期政策的一貫性和創新性。這一點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和 Maggie Bickford 主編的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一書有異曲同工、相輔相成之處。

本書最後三章由戴仁柱主筆，介紹南宋後期的歷史。這期間的一大關節就是理學興起、「道學之禁」以及後來理學正統地位的建立。戴仁柱主要從政治鬥爭角度入手，討論韓侂胄、史彌遠的決策動機和朱熹及其門人的興衰命運。戴仁柱認為，一般常講的「慶元黨禁」其實幅度不大、影響有限，規模遠不及北宋黨爭和秦檜專權時對士人的控制。此外，與美國宋史界流行的儒學轉向學說不同，戴仁柱完全沒有使用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韓明士(Robert P. Hymes)和包弼德(Peter K. Bol)的地方精英理論來解釋理學興起的原因，而是純以敘述基本史料為主，注重皇權、相權、官僚和理學門人的相互關係及互相利用的價值。筆者估計此章會和《劍橋中國史·宋史》的下卷相關章節頗有出入。

整部書在史料方面大致以《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幾部名著為主，輔以少數文集、筆記，對方志、詩詞、小說、墓誌銘等多元化史料開發不足。尤其是南宋部份的幾章比較單薄蒼白，因這個時段的記載來源不多。其實，這幾年史學界日益強調南宋的重要性，宋元明轉折也成為顯學，此書的後面幾章如果可以多吸收今人的最新成果，當可更精彩。

由於本書是不同作者分章寫作，所以有時各章之間的銜接比較鬆散，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第三章柳立言和黃寬重遵從國人習慣用Ch'ai Jung

(柴榮)一詞，而第一章作者 Naomi Standen 因柴榮是郭威的義子，故通篇使用 Kuo Jung 一名。這會令不熟悉此段歷史的讀者陷入困惑。這類細小問題理當避免。

《劍橋中國史》各卷的中文譯本自從問世以來就持續受到國內學者的注目，屢被引用和討論，其在中國學界的影響力甚至超出其在西方學界的地位。這有趣的現象背後有幾個因素：第一，中國學者對西方史學方法和史學理論頗感興趣，而《劍橋中國史》以濃縮手法將歐美學者的成果呈現出來，借助中文譯本，大家可以直接吸收借鑒其精華部份；第二，過去幾十年來，國內史學寫作手法已經全面轉型成章節主題式為主，斷代史方面更是如此，而《劍橋中國史》之特有的敘事體文筆反而讓大家眼前為之一亮，有助於史學工作者重新回歸「傳統」寫作手法；第三，與西方學界不同，國內歷史研究注重權威性大部頭著作，自身每年也產生頗多由名家掛名主編的綜述性巨著，所以看到《劍橋中國史》會有親切感，並直覺以為其在西方也是高山仰止。其實，劍橋史在西方更多扮演的是一種綜述性和導讀式的角色，創新開拓的方面比較缺乏。這一點國內學者在引用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無論如何，《劍橋中國史·宋史》之上卷寫作嚴謹、材料取捨得宜，並且整合海外漢學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大量成果，確實是上乘之作。其中不少觀點對國內學界來說可能十分新穎，對未來研究會有啟發性。上卷是政治軍事史部份，尚未出版的下卷將會著墨於社會經濟文化部份，是美國宋史學界的強項，由包弼德、伊沛霞、賈志揚(John W. Chaffee)、韓明士、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名家執筆，應該會更為精彩。我們也希望下卷可以盡快完成定稿、編輯出版，以饗學界。

胡永光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